

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的多维转向与进路优化

沈悦 金圣钧

摘要：中国国际传播事业当前所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问题日趋复杂，国际传播实践依旧受到部分国家的舆论压制以及话语内涵创新不足的掣肘。国际传播生态深度变革、西方话语陷阱悄然形成、“舍近求远”的传播目标偏移、国家叙事情感元素的匮乏导致了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构建困境与逻辑局限。包容性的文本叙事、精准性的传播叙事、建构性的共享叙事、对话性的共情叙事，共同形塑了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叙事框架。筑牢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话语内核的叙事立场、构建“临时文化共同体”弥合文化身份间距的叙事载体、创新以“智能数字沉浸+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多模态叙事、发掘以 ChatGPT 引领的智能微观叙事主体，构成了国际传播叙事效能提升的多元路径。

关键词：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叙事体系；ChatGPT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6—0173—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①中国话语体系与中国叙事体系成为了塑造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在意识形态领域突破西方霸权式话语裹挟，逐步提升国际话语权，有效解决话语匮乏窘境的理念创新。报告围绕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格局、传播体系四个维度指明了未来国际传播工作的前进方向。作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研究领域，中国国际传播事业所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问题日趋复杂，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依旧受到部分西方国家的舆论压制以及话语内涵创新不足的掣肘。因此，中国对外叙事体系也应适时调整，通过积极建构、符码优化、共情传播、动态调适的情感话语与共享性的概念阐释，助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寻找传递中国声音的有效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暖实力’赋能中国纪录片国家形象塑造研究”（项目号：2022ZWY006）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号：留金选 2023[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沈悦，男，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晨光学者，主要从事国际传播、国家战略传播、广播电视研究。

金圣钧，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文化、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① 共产党员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12371.cn/2022/10/25/ART11666705047474465.shtm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8日。

一、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波谲云诡的全球格局下,中国正前所未有的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世界感知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新时代正面、立体、多向度的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有利契机。中国共产党正以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注重加强国家间联系、争取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

就当前全球传播格局而言,一方面,中国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建构也应随着世界时局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在世界范围内,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矛盾激化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对于自身现代性价值逻辑的维护,中美关系已开启全面竞争状态,加之“黑天鹅”“后真相”等事件频出,全球资源配置走向和权力结构失衡,全球信息传播的生产规则与传播生态已发生骤变,导致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误导性信息比真相传播得更为迅速广泛。此外,以“深度伪造”“以假乱真”为特征的国际假新闻,使中国形象传播遭受“污名化”及负面解读。战争底色与现代性扩张作为国际传播理论诞生之初的底层逻辑,昭示出跨国信息跨越国界流动背后的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思维及动机。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将与中国相关的政治体制、人权、港澳台疆等问题,通过国际社交媒体的计算宣传,对中国及中国形象进行歪曲式解读,企图实现批评中国、贬损中国形象的目标。^①

在另一方面,全球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媒介文本的生产与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首先,传统的国际传播研究范式在考察媒介文本与国际受众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基于经典5W模式作为传播路径的参考依据而陷入了“媒介—受众”“技术—文化”“自我—他者”“自塑—他塑”的阐释框架^②,缺少对于当前以网络化、读屏化、流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传播生态的考察。其次,西方国际传播研究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与目标,是将对认知对象国/异文化受众的影响或传播效果作为其工作核心,因而对于结构化的主体与客体的“传—受”关系进行专门研究亦成为了顺理成章的判断。^③上述两类研究范式显然已经因全球传播生态的变革和话语自身的政治敏感性而日渐式微,原因在于全球媒介生态并非是线性实践的多元传播过程,而是基于认知、情感、价值观逻辑下共同作用下的跨文化行为。^④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多维的传播目标,如何在有限的国际话语场内增强中国国家形象能见度与认可度,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既需要外交智慧的纾困解难,亦需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凝练升华。本文所指的“话语体系”是一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综合表征形态。^⑤将上述定义延伸到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其涵盖了国家意志与国家价值的核心内容,是一套既能进行自我阐释,又能最大限度凝聚全球共识,还能基于不同群体特点实现精准传播、差异化传播的话语框架。

本文所涉及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构成了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两大体系”。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话语”是本体,也是传播能够取得实效的根本。^⑥“两大体系”已成为中国对外塑造国家形象的核心内容之一,^⑦是实现中

① 沈悦:《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治理框架建构》,《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② 田浩:《创造意义产消者:论纪实影像跨文化传播的情感主动性》,《现代传播》2022年第1期。

③ 胡正荣、李继东、姬德强:《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7—91页。

④ Jaram P., Young M. Peak, Meeyoung Cha.(2014).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Nonverbal Cues in Emotions on Twitter: Evidence from Big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2), 333-336.

⑤ 陈汝东:《国家视听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8期。

⑥ 曹进、赵宝中:《人工智能时代跨语言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的语言传播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⑦ 张广昭:《国际传播中的“概念创造”——基于习近平涉外演讲文本的政治话语分析(2012—2021)》,《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3期。

国国际传播实践在意识形态领域突破西方霸权式话语裹挟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国际话语权、争取国际社会合法性，能够让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①，并有效解决话语匮乏窘境的理念创新过程。其二，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理论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大外宣观”的主导思想。^②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提出呼应了上述号召，成为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新尝试，也是打造既蕴含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③，成为了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主体性的新探索^④；“两大体系”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巧传播”方式。^⑤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就是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充分、更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⑥其三，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能见度的新视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既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念指引，也为未来国际传播“元软实力”塑造指明了方向。^⑦国际传播叙事体系作为海外传播文本与符码^⑧，对国家形象传播的正向度行进具有建设性、对话性、启发性的作用。

总体而言，学界对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概念、范畴、实效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但需指出的是，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相关研究，不应局限于话语体系建构、争夺国际话语权等领域，其内容还可以更加丰沛和广泛。在国内形成的主张、理念及共识需要得到全球的理解、认可与支持，这些都要求加快构建完整、完善、可协调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因此，本文中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是作为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以期探索出既能在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又能面向世界不同群体特点实现差异化传播的新话语框架。

二、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构建困境与逻辑局限

为实现中国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在海外语境的顺利“落地”，明晰国际传播叙事的当代困局，需从话语理论视角对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内嵌逻辑进行深度剖析。无论是讲好中国故事抑或是当前加快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其话语背后内嵌着国家间对话的内置动因。从国际形势与中国国情观之，中国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应既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性，又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降低国家间先导性排斥，弥补过去重“宣传”“说理”的视阈缺陷，以新时代国家叙事为分析单位，为实现全球互惠性理解创造可能。

（一）平台化、去边界化的叙事环境：国际传播生态深度变革

随着全球算法技术的普及与高速发展，各类数字平台的多元行动者正成为国际传播的主阵地。全球信息传播的细分化重组，导致国家话语传播的宏大格局逐渐下沉，因此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也应积极调整。

首先，如今的国际传播“主场”正在日益征用流动性主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强互动性改变了传统国际传播的主渠道，社交媒体平台重构了国际社会新型战略利益边界。5G技术构建起“万物皆媒”的内容生态，促使中心化的链式传播结构再度中心化。国际社交媒体将个人与全球系统连结在一起，“人人都有麦克风”皆能成为国家故事、国家形象以及政党形象的传播载体，为全球民众创造了新的“虚拟共

① 徐艳珠、张志安：《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观念变迁轨迹》，《出版发行研究》2021年第10期。

② 周庆安：《超越有形疆界：全球传播中的公共外交》，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

③ 施旭：《动荡世界下中国话语全球传播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④ 钟新、金圣钧：《疫情背景下国际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热门报道框架——基于大数据的扎根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年第5期。

⑤ 陈先红：《公共关系学的想象：视域、理论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86—189页。

⑥ 吴雷、姜飞：《建构与解构：“西方”概念祛魅与中国国际传播话语重塑》，《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⑦ 史安斌、杨晨曦：《国际传播的变局与“元软实力”的兴起：内容·渠道·受众》，《对外传播》2022年第11期。

⑧ 杨泉泉、李本乾：《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传播机制研究》，《中州学刊》2019年第9期。

“共同体”^①，大量个人媒体、社群媒体、虚拟网络社区等皆拥有了垂直领域的解释定义权和传播影响力^②。其次，部分西方国家将“遏华国际传播”作为其对外传播事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一国外交政策的施行与区域形势、政治基础、话语结构、国家利益等深度勾连。^③正如德布雷所言：国家政治权力的实施需要话语，而话语的建构则需要权力再生产与言论再生产^④，而美国正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为国际话语权生成与跨国传播建构其合法性。最后，国际舆论斗争的复杂性加剧了中国形象塑造的难度。在充斥着国际假新闻的后真相液态社会，舆论战、污名化等信息“武器化”趋势，已经或隐或显地在各类国际场域长期存在，所以，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将成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调适的驱动力。

（二）隐蔽性、排他性的叙事渗透：西方话语陷阱悄然形成

由于国际传播本身即带有话语渗透与政治属性的本色，中国作为“后入局者”极易陷入西方舆论各类预先暗藏的话语泥沼之中。尽管近年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显著提升，然而，“西强东弱”的世界整体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议程设置能力与海外媒体强大的话语渗透力，发明或建构的某些词汇表达可能会使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探索陷入被动局面。

其一，“中国例外”话语陷阱作为“他者”话语，是将不同于自身的异质个体/群体建构为明显区别于主流认知/群体的另类角色，形成对抗性格局并建构话语生产的对立或对抗关系。^⑤当前国际舆论刻意将中国塑造为迥异、例外化、标签化、特殊化的“他者”，以实现孤立、打压、污名化中国的政治意图。其二，部分西方国家的极右翼势力利用“引战挑衅”话语，企图污蔑抹黑、制造对立、混淆视听，并利用互联网媒介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和操控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海外社交媒体、高科技跨国企业、海外华人等蓄意打压，对港澳台疆等问题蓄意污蔑，创设了一个具有信息战意味且充满攻击性、侵略性的“后真相”话语空间。^⑥其三，与上述两类话语陷阱不同，语用预设词汇陷阱在国际信息流动中更加难以察觉。这类话语潜藏在词汇的语篇背景、深层含义以及社会认知中，特别是西方舶来学术词汇中。例如，“中国崛起”“中国梦”“中国方案”“国别战略”“软实力”等用语，不得不在全球现代化叙事体系中接受西方有色眼镜的审查。上述话语通常与意识形态输出、霸权政治相勾连，已经脱离了其最初的定义，反而会引起信息接收者的话语误解，从而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理念产生负面刻板印象。

（三）顶层化、局部化的叙事局限：“舍近求远”的传播目标偏移

如今，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从过去保守、被动、低调向自信、主动、开放转变。然而，从国际传播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等层面来看，其主要针对的国际受众集中在了绝大多数的欧美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及周边国家，从而造成了部分目标好高骛远、舍近求远。^⑦

古人云：“近者先到，邻者先得”，中国国际传播固然要重视大国或重点地区，也应同等甚至首先考虑周边国家及地区。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成为中国国际传播事业推进的桥梁与中介，而非成为部分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甚至对中国及中国形象进行污名化传播的前沿阵地。首先，世界结构性力量的调整加速推进了全球国家主义范式的登台，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构成了关键性结构因素。由于西方话语体系与中国外宣系统的结构性互斥愈发严重，中国话语及中国形象的缄默塑造了中国的“刻板印象”，亟

① 孙宝国、沈悦：《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东岳论丛》2019年第8期。

② Peterson.E., Allamong.M.B.(2002). The Influence of Unknown Media on Public Opinion:Evidence from Local and Foreign News Sour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16(2),719-733.

③ Dimitrov R.(2020). Communicating off the Record, *Public Relations Inquiry*, 9(1), 81-102.

④ [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⑤ Bellout.T(2013). *Derrida's D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Writing, self and other*, Switzerland:Peter Lang CH,219-222.

⑥ Hannan..J(2018). Trolling Ourselves to Death?Social Media and Post-Truth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3(2), 214-226.

⑦ 陆地：《周边传播理论范式的建构和深化》，《当代传播》2021年第3期。

需寻求新的国际传播理念及渠道,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发展一以贯之的价值趋向与道路选择。而周边国家不论是在地缘疆界、贸易往来还是文化交往等多方面均与中国发生多维联系,并且能够降低共时性下国家叙事传播的空间性、文明性区隔。

其次,同质性与混杂性、全球性与民族性不仅是当前国际传播一体两面的意义网络,亦是周边传播在地域性与国际性双向互动过程中的显著表征。如何“借邻壁之光,照自家园地”,而非简单从自由、利益驱动等原因来解释当前中国国际传播效能偏弱的问题,是未来厘清国际传播诠释维度的新场域。此外,由于价值观、基本目标、国家意志、世界观等方面的深层次冲突,决定了周边传播并非是国际传播的微观化,而是介于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之间的信息传播,其主体多元性更为突出,包括主体国家与认知对象国的对内与对外传播实践。然而,国内学者针对周边国家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成果较少,没有形成系统的周边传播理论体系或案例指引,因而造成与部分周边国家/地区“近而不亲”的传播窘境。

(四) 共鸣性、个体化的叙事需求:国家叙事尚缺微观情感元素

跨文化传播奠基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认为,文化间传播的生发机制是基于人性相通的前提。^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则是希冀通过共通情感、共通理念、共通价值的包容性沟通,达到国家话语认同的意义层面,形成国家间叙事传播过程中的互惠性理解。国家的文化身份是在具有相对差异性的语境中产生,因此国际叙事传播的实质就是主体间积极对话的过程。然而,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存在重对外宣介、重单向说服、重新闻发布会等工具理性的桎梏^②,以暖人心、易共情、促理解又不失民族特色与文化基因的多元叙事创新实践则较为少见。

首先,国际传播叙事搭建的核心建基于文化差异之中的观念、认知惯习和社会环境,而文化差异本身存在两个跨文化“关系”,一是“跨文化地域”,二是“跨文化阶层”^③,调适二者各自观念和认知层面的“文化共识”需要通过文化实践来打磨,但寻求情感上的共鸣相较而言更容易构建意义交集、形成理解和对话。首先,对于“跨文化地域而言”,有学者曾提出“情感地缘政治学”^④的说法,认为情感可以成为一种解释世界和国家行为的方法,全球社会中不仅存在着意识形态地图和文明地图,还存在着复杂的情感地图。全球媒介化进程加速了国际主体间的情感互动,不同社会组织间、民族间和国家的交往受到国际舆论所引发“情感效能”的影响,使得情感地缘政治成为识别或判断国际关系、国情差异的隐性参考标准。在此基础上,中国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建构当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感叙事为根基,寻求国家叙事层面的情感共通。其次,对于“跨文化阶层”而言,国际传播叙事需关注到全球范围内阶层化、个体化的情感传播趋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全球风险社会话语的平台化转向融入文化个体间的日常互动之中。全球公众复杂、极端的情感冲突渐趋叠加,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微观“情感共同体”在心理上、认知上对共同文化的确认。中国国际传播叙事长期以来倾向于对“大国理性”的讲述,关切跨文化微观共同体的情感叙事搭建尚缺乏精准性和策略性。最后,国际传播的情感叙事亦不能忽略本土文化中的“个体化情感”,其亦是构建中国特色情感叙事的文化基源。中国同西方的“个体化”特征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可以描述为具有生活关系和集体扩展性特征的“无功德的个人”^⑤,西方社会的个体化则是富有私有制传统、由个体本位设想公共社会的个体化。如何搭建不同社会传统中“微观个体”这一共性面向的差异化理解,并融入中国特色的策略性情感叙事,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跳脱“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叙事惯性,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理解力与阐释力是当前亟待考量的问题之一。

① [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2—53页。

② Hagström L.,Gustafsson K.(2021).The Limitations of Strategic Narratives:The Sino-American Struggle over The Meaning of COVID-19,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42(4), 415-449.

③ 王鑫:《从共通走向共识:国际传播跨学科基础理论引入与研究进路》,《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④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1—20,147—150页。

⑤ 杨君:《个体化的中国叙事: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0期。

三、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框架的多维向度

“叙事”概念最早源于文学领域，主要是研究故事的情节、结构及形式。^①近十年来，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等领域的众多学者逐渐尝试将叙事这一概念引入到本学科研究之中，以期帮助大众理解文本、传播现象以及认知相关事件的过程。国际传播叙事蕴含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描述，并将上述议题有机嵌入进世界体系之中，以提升本国在世界范围的认同度。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由宏观叙事有机构成，在全球传播平台化时代，最初的大叙事式微之后，原本处于非主导性的微观叙事将会繁荣，国家叙事将被赋予新的意义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②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成为思考全球问题与国家间关系的总体性语境，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涵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挖掘新的话语资源有助于国际公众客观感知、评价中国形象，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理论支点。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建构不仅关涉国家话语系统的顶层设计，还囊括中国故事理论创新的文本叙事、传播叙事、共享叙事、共情叙事四个方面。

（一）包容性的文本叙事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对于态度/信念的说服与控制研究是传播学和叙事学所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大部分研究成果以修辞论证所引发的辩护、争论或其他形式的叙事传播修辞为主，而忽视了叙事类讯息的说服传播效果研究。叙事作为一种图式，赋予人类时间经验和个人行动以意义。时至今日，叙事逐渐从单一维度走向复调修辞，并将所有人类传播都定义为一种叙事行为。故事化沟通是传递信息最有效的形式，也是构建文化感召力的内在动能。^③国际传播叙事隶属于中国故事体系范畴，是文化软实力助推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新元素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国际传播叙事是对于过去民族国家单一身份叙事的超越，其要义是展现中华文明包容互鉴的内蕴，通过多样性的叙事传播语汇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调和全球文明与传播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此类叙事亦作为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居间者，逐步成为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的“暖实力”。^④

包容性的文本叙事主要涉及中国故事生产的元话语，其一是在新的全球传播语境中，从历史回溯和事实廓清出发，对各类内容叙事进行有机整合，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彰显中华民族伦理特质的世界关怀。其二是围绕“叙述者”“文本”“接受者”三个核心逻辑环节，将文学叙事、影像叙事、新闻叙事、战略传播叙事等多维度叙事载体，同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相结合，以话语说服力、道义感召力、文化吸引力塑造直击人心的包容性叙事。其三，将中国叙事升华为中国话语是语义转化、升维的辩证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所隐喻的中华文化精神，有望改变过去故事精彩但话语贫乏的叙事窘境，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叙事资源和实践话语，激发人类包容共享的共同体价值观。

（二）精准性的传播叙事

当传播元素加入到叙事行为之后，叙事文本上升为叙事传播范畴，叙事文本本身即兼容了“讲故事”与“传播”两个概念领域的信息输入，从而建构了新的意义。^⑤其不仅要求叙事主体阐明故事中的信息元素，也应通过叙事传播的多维透镜，管窥故事设计的内容策划、完成阶段的内容分析以及认知对象国的传播效果评估等。

① Mumby D.K.(1993). *Narrative and Social Control:Critical perspective*, Newbury Park,CA:Sage Publication,Inc,169-173.

② 中国军网：《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发布，这些提法值得关注！》，http://www.81.cn/y-l/2022-10/31/content_10195121.htm，2022年11月15日。

③ Polkinghorne D.E.(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2-205.

④ 沈悦、金圣钧：《从软实力到“暖实力”：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创新的话语、维度与愿景》，《东岳论丛》2023年第2期。

⑤ Kamler H.(1983).*Communication: Sharing our Stories of Experience*, Seattle: Psychological Press,49.

为适应当前全球信息传播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实现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的精准传播，首先应将传播目标细分化、厘清当前全球传播中所面临的话语困境作为叙事框架建构的出发点。同时，将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研究重心置于全球经济贸易结构、地缘政治结构、文化交往结构中综合考量与定位。其次，从舆论逆差的问题出发，制定相应的叙事传播战略，合理分配中国人的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中国梦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故事，在不同国家/区域的话语内容与话语表达。^①最后，在传播内容上实现从“强国”形象向“好国”故事的理念转向。具体而言，在西方现代性遭遇结构性危机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半失灵”的状态之下，叙事主体以更为系统化的传播逻辑，最大限度地调动事实、情感、理念、形象等各类话语资源。

目前，中国的国际传播叙事理论更多还是舶来品，其创造性转化与全球阐释力都受制于这些理论生产时的情境有限性与在地适应性，很难完全有效贴合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全球表达与传播效能提升。因此，精准叙事的实现，需要寻找国际传播对象感，亦需要人们不仅关注全球文化价值表面的符号性意义，而且应将文化价值背后的时空属性和时空逻辑，与其承载的物质、生产、地缘等现实因素实现多维连接，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驱动“强国”声音与中国叙事之间的语义可塑性，并逐步过渡为东亚“好国”故事的共通意义叙事。

（三）建构性的共享叙事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组织化、建制化表征的国际传播实践正随着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竞合诉求之演变而发生变化。作为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出的包容性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涵层面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演绎、延展和创生奠定了理念资本，亦在外延框架层面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基点，廓清了新时代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条件、历史语境与行动坐标。建构性的共享叙事则在此基础之上，以“人类同命运”传达休戚与共的全球共识认知，规避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价值物化”和内嵌着冷战基因的资本主义元叙事的窠臼，在互相尊重各国文明特质的同时，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边界的认知坎陷，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叙事共通空间。

建构性的共享叙事塑造，一方面既能直接勾勒出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角色和话语特征，亦是国际传播理论创新提供了一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对全球命运高度关注的学术棱镜。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道路亦是不断集纳及生产中国文化、中国话语、中国理念、中国故事的动态过程。^②中国国家形象的正面建构不仅依靠自我设计或是客观既定的个体实在，还须有以建构性话语为纽带的国家叙事样态为支撑。另一方面，建构性的叙事观并不是结构化的形式过程匹配，而是囊括国家利益、历史经验、意识形态、刻板印象等集成性、组织性、系统性要素。中国在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世界民众则“隔屏相望”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土“秘笈”。建构性的共享叙事观是在深度全球化语境中凸显中国人独特、整体的价值立场，同时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段性叙事议题，有机植入国家话语修辞逻辑的积极尝试。

（四）对话性的共情叙事

国际传播的主流趋势是鼓励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而以西方现代性叙事为旨归的经验研究大多关注由后冷战共识所引发的数字化生存转向平台化生存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终端接收、使用的技术主义“地球村”的隐喻，忽视了情感作为国际传播“助推器”的作用。在深度全球化时代，扎根于智能媒体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需打破传统线性逻辑，转向情感化、语境化的新视维。在全球传播生态嬗变过程中，情感（Emotion/Affect）对话不仅在传播学理论体系建构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且逐渐成为

① 陈亦新、林爱珺：《西方污名化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逻辑与中国话语策略》，《当代传播》2021年第4期。

② 赵欣：《国际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故事叙事之道——“第一主讲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涵的国际分享》，《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期。

人与全球数字媒介生态感知、互动、联结与行动的重要渠道。^①

在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研究中，情感的地位及作用被不断发掘和持续探索。^②对于国际叙事传播中共情元素的解读已经不再局限于纯粹情感或纯粹理性的传播说服范畴。在意识形态贯穿国际传播全链条的现实格局下，国际传播叙事需遵循“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道化人”的逻辑，构建情感升维的立体传播战略体系。对于共情叙事的研究有助于在国际传播中跨越意识形态的壁垒，将国际传播效果的隐形因素重新带回公众视野。纵观当前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在西方话语与叙事体系中所遭遇的话语困境，除了内容选择上的事实偏差问题，还包括信息表征与接受中更为隐蔽的修辞与说服问题。尽管传统媒体近年已开始重视文本生产与叙事中的情感接受问题，但是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化表达与共情共鸣则更为普遍与多元^③，已成为媒体文本诉诸情感获取“流量密码”的“常规操作”。共情叙事强调立足用户的情感认同，对于实现“讲好中国故事”而言具有切实的意义。^④共情叙事相对于其他接受方式而言往往能够增强信息文本（特别是可视化文本）的可信度与感召力，强调挖掘文本的情感内涵与意义落点，从而有助于提升中国故事及其深层的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与认同。

四、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效能提升的优化进路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叙事的内在逻辑逐渐完成了从宏观“民族生存”本位到微观“人民美好生活”本位的转变。对于中国叙事的国际传播而言，其核心在于处理好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全球性的关系问题，既需要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体现鲜明中国话语，又要展现以中国叙事回应世界问题、讲好世界故事的能力，故而需要通过叙事主体、叙事立场、叙事载体和叙事手段等层面的设计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综合前述中国国际传播叙事观的四重转向，本研究认为，“包容性”内容叙事观需要明确围绕核心叙事立场的话语体系；“精准性”传播叙事观需要找准弥合跨文化交际壁垒的叙事载体；“建构性”共享叙事观需要借助凝聚注意力资源的复合型叙事手段；“对话性”的共情叙事观则需要发掘潜在的关键叙事主体。

（一）筑牢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话语内核的叙事立场

当前，人类文明处于错综复杂的十字路口，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华文明、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是立足中国语境、生发中国叙事、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现代化文明根基。

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与时代价值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集合体，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文明性特征。新技术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文明现代化的判断标准，但在人类文明交往的历程中，文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文明都蕴含着一类族群通过民族叙事和文化符码形成身份认同和归属的价值谱系，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代表人类文明革新的方向，尤其在跨文化交际中，“对立思维”“逻辑中心主义”以及“主客二分”的对话理念只会弱化异质文明交流过程中的互通互信。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文明中一脉相承的“和合文化”为元话语，强调以合作共赢、共享共存为价值理念的社会主义文明结构，其突破了西方现代文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征的发展局限，以此为叙事内核摆脱了以“民族眼光”看世界发展的旧叙事观，转为以“世界眼光”看共同发展的新叙事观。因此，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传播与叙事进路而言，其话语建构应围绕以下三条核心路径展开。

一是在世界变局中书写中国故事，在立足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实践中增强国际议题设置能力。中

① Hagström L.(2021). Great Power Narcissism and Ontological (in)Security:The Narrative Mediation of Greatness and Weakn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5(2), 331-342.

② Verma R.(2020). China's Diplomacy and Changing The COVID-19 Narra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75(2), 248-258.

③ Orgeret K.S.(2020). Discussing Emotions in Digital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8(2), 292-297.

④ 刘涛、刘倩欣：《新文本 新语言 新生态：“讲好中国故事”的数字叙事体系构建》，《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0期。

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一方面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叙事融入世界命运之中,不仅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选择,也将世界命运同中国命运彼此联结;另一方面,世界变局也为中国叙事提供了话语来源,使中国故事在对世界格局的深刻把握中不断革新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以推动将中国故事书写的文明形态纳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①,增强对国际议题的判断能力和话语设置能力。

二是在发展叙事与问题叙事的协同回应中调适中国故事的内在逻辑,构建面对共有挑战的跨文化共识。在“不确定性”和全球社会分化并存的时代,经济下行、贫富分野、文明冲突等深层次社会矛盾以及战争冲突、气候灾害等引发时代焦虑的不稳定因素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中国的国际传播叙事除了建基于发展共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核,还需要找寻“人类共有矛盾”开展问题叙事,以此达成同国际社会的有效对话。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含的和平发展观以及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中发展出的具有极强抗逆力的社会生态可以对国际社会中的问题矛盾提供修复与重建的叙事资源^②,以此不断调适中国叙事的内容有助于获取更广泛的国际关注。

三是在提炼中国式现代化成果中创新对外叙事体系,提升话语转译能力和传播主动权把控能力。当前,国际间交往与传播的媒介仍以西方话语为核心表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话语对外传播中话语本义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因此,创新对外叙事体系需要注重厘清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提炼如和平崛起、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原创性、代表性的中国理念,并通过提升话语转译能力加强中国叙事话语的跨文化阐释能力。在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提升对关键理念和术语对外传播的主动性,压缩国际舆论场域中“他者”的话语操纵空间,把握自身生产的和传播叙事话语的主动权;在另一方面,需要契合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环境和认知逻辑,通过具象化的转译形式解构或重构抽象的宏观理论话语,在诸如“以当地历史经验阐释中国话语”的叙事中减小文化折扣,达到表层意涵与深层意涵有机统一的精准国际传播。

(二) 着眼以构建“临时文化共同体”弥合文化身份间距的叙事载体

在国际传播的实践过程中,文化间距是不同文化在比较和互看“异同”中对彼此差异的关注,法国汉学家朱利安由此提出的间距理论,将中国思想视为能够为西方哲学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对话对象,故而间距给予中西方足够的想象空间与互补的可能性^③。笔者认为,在平台社会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传播的对象应是互联网社会中的每个文化个体,文化间距弥合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同个体文化身份差距的调适。

在数字化技术赋能的全球化浪潮中,无论个体身处何方,世界各地个体的文化身份都多少面临着某种程度的跨文化适应,个体文化身份亦面临着全球化和杂糅化。需要认识到,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文化群体在成为国际移民、接纳国际移民等文化实践中,形成了双文化身份或多元文化身份,故而演化出更成熟的跨文化身份协商与对话能力。另一方面,人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拥有通过环境交换信息、与环境共同进化的能力^④,正如海外学者所提及的“跨文化人格”^⑤的日渐形成,即人们已经相对自由地摆脱了一种程式化的认知反射模式,并拥有利用所处文化建构自我身份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一种指向“杂糅文化”的“临时文化共同体”有望成为中国国际传播有效的叙事载体。在单边主义、种族主义、技术霸权等现实状况的影响下,文化个体间的交流与传播面临着文化认同风险、

① 吴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与中国叙事》,《探索》2022年第4期。

② 周庆安、刘勇亮:《多元主体和创新策略: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

③ 刘毅青:《跨文化比较的困境及其重建——以朱利安间距论为中心》,《中州学刊》2022年第1期。

④ 许颖、金圣钧、蒋贤成:《节日的“相遇”:跨文化传播中文身份的调适与赋魅——以多国孔子学院节日文化实践为例》,《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5期。

⑤ Kim Y. (2008).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4), 359-368.

文化信任风险、文化表达风险等多种形式的^①，“临时文化共同体”不强调一种包括文化形式、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的永续认同，而是基于一种共有的经验性文化现象，在具象化的“共同体”叙事引导下形成一种表层共享性和深层共通性有机统一的文化共识。“临时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可以主要依托于以下两个文化叙事载体。一是注重设置在以奥运会、国际音乐节等为代表的重要国际文化场合中的中国叙事。人类文化的连续性主要在于共有文化体验中文化行为和文化情感的连续，而在电子媒介时代，体育、音乐、影视等文化活动可以使文化个体通过虚拟在场跨越文化边界、共同实施文化行为，不同个体在“共时性”体验中逐渐形成情感共鸣，在同自身所属文化的互动和杂糅中重设自身文化身份的边界，形成基于临时跨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二是高度关注以节日为代表的共通性文化仪式在跨文化叙事中的作用。节日仪式不仅是不同文化独特性和民族身份认同的表达，还凝聚着家庭亲情、追宗忆祖、向往美好的共通意涵，因此节日作为文化交点的“居间”是构建共同体叙事，推动异质文化个体形成“临时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仪式化场所。诸如中国节日活动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在地化设计与传播，就能够更好地调度在地文化群体与中国文化个体之间基于“共同情感”的文化交流，满足文化个体对自我文化身份意义的满足和共同体主体性的建构。

（三）创新以“智能数字沉浸+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多模态叙事手段

叙事传输理论认为，当人们被传输进故事中时，人们会将注意力投至故事本身，信息解码和分析的过程转换为“叙事驱动”模式^②。如何通过设置具有“临场感”的叙事手段调度受众的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成为叙事内容具备说服力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数字化传播环境下，国家观念与形象间的互动逐渐由客观物质实体的对话转向技术赋能下感官符号的交互，通过声音、图像、视觉、动作等触发听觉、视觉、触觉的多模态叙事方式书写特定意义。因此，在当代国际传播语境中，话语权争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用多模态符号资源和媒介技术资源的国家叙事之争。

在多模态叙事的基础上，沉浸式叙事（Immersive Storytelling）的概念被提出，其意指一种使受众置身于身临其境感的叙事形态，主要包括通过实践层面上沉浸式技术的使用和心理层面上专注于叙事的沉浸体验两方面。^③以此叙事手段补充升维多模态叙事有助于把不同文化中“高冷”的叙事概念去陌生化，从而使中国叙事以具身体验和具象移情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其他文化接触者熟悉的模态资源，拉近心理距离。

首先，在内容呈现方面，数字沉浸式的多模态叙事需以视觉索取和心理交互的方式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建立中国叙事同文化他者间情态化的想象关联。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主要包括中国国情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全面发展故事、生态文明建设故事和和平发展现代化故事^④，在对此宏观故事的沉浸式建构中，需要首先通过新技术应用进行场景细化，诸如以组织文博策展、创新影像呈现、再现文化记忆等方式将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形象化，通过“索取”受众视觉建构“自我想象”的临场感，唤起参与者与索取者间心理层面的情感联结^⑤。如在援引历史事件讲述社会主义发展故事时，可参考BBC采用VR技术制作的《1943柏林闪电战》，其采用真实事件的历史音频配合3D智能视频技术重建VR影像，给予参与者“化身”在场的感官体验。又如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运用VR配合环幕投屏和实时跟踪技术，创制出跨时空、可任意变换视角的古今对话（如司马迁穿越时空与后世对话等），通过时空交错的复合维度视听体验营造了一种沉浸性与亲密感并存的共情式心理交互，增强文化叙事的说服力。

其次，数字沉浸式的多模态叙事需厘清四类基于文化接触者的叙事策略，即观察被动型、观察主动型、

① 沈一兵：《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与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人文杂志》2022年第3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网：《以多模态话语传播中国故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207974008501841&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2023年2月10日。

③ Gröppel-Wegener A, Kidd J. (2019). *Critical Encounters with Immersive Storytelling*, London: Routledge, 11-13.

④ 钟新、金圣钧：《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党的二十大精神国际传播的关键议题》，《对外传播》2022年第12期。

⑤ 李飞雪、张钰惠：《竖屏传播：央视春晚的多模态感知与情感体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11期。

参与被动型和参与主动型^①，以此推动文化接触者对中国叙事本身的沉浸式理解。其中，观察被动型是传统叙事策略的体现，受众扮演被动观察的角色，因此需如前所述，由故事讲述者建构具备视觉索取功能的多模态叙事；参与主动型赋予受众在叙事中控制走向、扮演角色的权力，兼具沉浸性与交互性，却不适合国际传播中以策略性叙事为主的内在要求。观察主动型策略赋予受众自主控制叙事情节的能力但并非成为故事角色，凸显交互性；参与被动性策略则创造受众在叙事中角色扮演的条件，但叙事走向不由受众控制，凸显沉浸性。上述两类叙事是多模态叙事应用中可以遵循的策略模式，较好的应用案例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精心打造了“时光博物馆”流动展览大篷车，参与者可以任意选择多项创意互动体验，重温或感受七十年时光碎片中衣、食、住、行、文教等方面的物质性体验，以人们自身的文化记忆和切身经历沉浸式地认知“改革开放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叙事主题。该模式可以同样应用至中国承办的重要国际活动场合中，通过数字沉浸技术和多模态感知技术赋予受众角色扮演或自主选择叙事的权力，建构具备感官真实、增强现实、虚实交互效果的中国叙事组织形态。

（四）发掘 ChatGPT 引领智能传播变革背景下的跨文化微观叙事主体

纵观国际舆论场，从硬实力出发的强者叙事、基于国际传媒巨头和利益控制的资本叙事、脱离他国实际境遇的抽象叙事等文化帝国主义叙事^②，在数字化传播技术等赋能之下不断变换新的叙事形式，其作为宏观层面渗透国际舆论的话语力量不降反增。如今，随着 ChatGPT 的全球推广，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推动了人类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③，人工智能的使用由“专用化”转向“通用化”的过程中也推动着国际传播作用逻辑的转变。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ChatGPT 首先将对国际舆论、文化交流、信息安全、政治宣传、意识形态斗争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一种基于算法迭代不断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任何携带偏见性、隐私性的内容都会被纳入标注文本的训练之中，并在整合后在新的回答中反馈给新的使用者。因此在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中，经由 AIGC 模型生成大规模虚假新闻、仇恨言论、意识形态误导等暗中操纵国际舆论的现象将成为潜在的增长隐患，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在更大程度上转换为技术间的博弈。目前，中国在大型语言模型开发技术方面还与世界存在一定差距，ChatGPT 相关产业技术壁垒较高，关键核心技术限于数据资源、算力资源及人员投入等因素，中国企业短期内实现突破尚存较多困难^④，拥有国产自主的智能平台接口、训练内含自主话语体系的语言数据是弥合技术差距、增强国际传播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

其次，ChatGPT 虽改变了人类传统的信息搜寻方式，但其本身仍属于一个在演化的过渡型产物，目前与对国际传播的“精准化”需求难以有效衔接。作为大规模语言模型，ChatGPT 采用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机制，在人机对话交互的过程中亦存在缺乏事实依据和专业性、存在知识边界限制等现实问题，受语料质量影响较大。ChatGPT 有很强的信息搜集和整理能力，但当涉及细节问题和专业知识时，ChatGPT 的回答倾向于“简单化”，甚至“问题越确定、回答越不确定”。因此在国际传播实践中，AIGC 提供的叙事只能在宏观层面上贴合概率模型输出的“最大共识”，这种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亦受到社会建构与权力资本运作影响，这一方面为“共识性偏见”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遮蔽了更为核心的、以“个体互联网叙事”传播为特征的国际间对话，故而难以有效改善跨文化微观主体的叙事实践。

因此笔者认为，在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智能传播对国际传播的影响逻辑下，国际传播叙事应当加强平民化视角下的个体微观叙事，特别是对跨文化个体叙事的关注。跨文化微观叙事主要包含用户自身作

① 李锦绣、林泽斐：《面向数字人文的沉浸式数字叙事：现状、路径与展望》，《数字图书馆论坛》2022年第10期。

② 马忠、达雅楠：《国际传播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话语批判及中国应对》，《探索》2022年第4期。

③ 钟祥铭、方兴东、顾焯焯：《ChatGPT 的治理挑战与对策研究——智能传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与突破路径》，《传媒观察》，2023年第3期。

④ 西桂权、谭晓、靳晓宏、张婷：《挑战与应对：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的多样态安全风险归因及协同治理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为微观叙事主体的跨文化，以及微观叙事内容的跨文化两层含义。

首先，用户作为微观叙事的跨文化主体可以率先联系到近年来因被中国网民关注而走红的“洋网红”。笔者认为，在传统的洋网红之外，亟须关注的是更具中外“融合性”特征的社交媒体博主。一是以“田纳西 Jay 和 Ari”“德国陶渊明”等为代表的“中外组合家庭”博主。这一类博主的家庭由中国人和外国人组合而成，通过在海外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叙事展现出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沟通及融合的过程（如邀请外国亲戚制作品尝中国美食等），以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展现外国家庭成员作为“文化接触者”体验中国文化的反应。其叙事主线基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除了展现积极的文化认同外，“他者”视角的真实反应，如“不能接受动物内脏”“对于有眼睛的鱼料理恐惧”等差异化的情感体验也悉数呈现，以兼具融合性和冲突性的微观叙事向观者提供了一种真实可感的中外文化适应过程。二是以“泰国阿航”“拜托叫我林先生”“西班牙陈挺”为代表的，以中国人为主体身份的海外旅居博主。这一类博主的叙事主线则以在当地生活或旅行过程中同当地人、当地文化的接触和体验为主，以“中国人”为第一人称视角的“他文化”叙事为中国叙事的建构提供了地方性的参照，有助于中国叙事更系统的与当地文化联结，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中国身份同在地群体的跨文化互动，即如戴维·莫利所言，在跨国地理的紧密互动中，文化主体不仅要以他者的角度看待世界，还要让他者来“寻找”我们、“影响”我们^①。国际传播叙事应更多地包含如何从中国人的视角讲述世界故事的亲和力叙事，由此，在地个体或群体得以更积极主动地与“我们”进行跨文化接触，从而提供更多样化的叙事资源。

其次，在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建构中，微观叙事内容的跨文化传播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同时风靡于国内外视频平台的叙事内容主体：一是宏观媒体层面以“云南野生象北上”事件为代表的全球媒介事件。此类议题虽关涉微观的生物多样性叙事层次和大象这一微观叙事个体，但却触及全球关切。对于此类议题的挖掘可以更深度地构建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共同体等为代表的人类共同议题的中国叙事，向世界展示中国在世界性问题方面做出的努力。二是社交媒体层面以“reaction”内容为代表的海外博主反应内容生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平民化叙事视角的体验反应，如草根外国博主对各色中国美食的在场体验（亲自品尝后的反应）和离身体验（观看“舌尖上的中国”“李子柒系列”等视频时的反应）；另一类则是基于专业化叙事视角的反应与评价。例如，歌手 Waleska Herrera 观看《我是歌手》节目中中对谭维维、周深等中国歌手的精彩演唱并给予专业点评的反应视频。这一类内容从他者视角出发，为中国叙事提供了极具互动性的传播符号，即时反应的公正客观性和专业视角的权威性不仅是展现文化差异和文化理解过程的最佳方式，也是传播“独特”文化形象、通过若干微叙事建构“真实”中国国家形象的理据，是中国叙事汲取叙事资源、架构叙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 语

2023年10月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中强调，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②近年来，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话语困境仍难以消弭。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注定要彻底改写西方现代化的版图，并在自主的现代性探索中孕育人类文明新形态。真实、生动、形象的描摹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故事需要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支撑，才能进一步实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落地化和效能化。中国国际传播事业正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政治竞合的压力传导，结构性的数字地缘冲突将成为新常态。全球危机不断、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国际传播得以开展、升级与创新的机遇。

① [英]戴维·莫利：《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郭大为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② 求是网：《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切实承担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https://www.qstheory.cn/wp/2023-10/09/c_1129907620.htm，访问时间：2023年10月9日。

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兼具时代追求、理论意义与实践导向的全新命题，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因此，如何建构可感知、可沟通、可调适、可共情的中国自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将是未来中国国际传播实现“破局”的过程中，值得继续思考和探究的新课题。

The Multidimensional Turn and Rout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EN Yue^{1、2}&JIN Sheng-jun³

(1.Shanghai Academy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rea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2.Shanghai Institution of Tour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234; 3.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new challenges and complexities faced by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re increasing,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re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 sup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 from some countries and a lack of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content.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cosystem, the silent emergence of Western discourse traps, a shift in communication objectives towards "sacrificing the near for the distant", and the scarcity of national narrative emotional elements have created difficulties and logical constrai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system. Inclusive textual narratives, precise communication narratives, constructive shared narratives, and conversational empathetic narratives have collectively shap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framework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stablishing a narrative position with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the core of discourse, building a narrative carrier that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cultural identities with the temporary cultural community, innovating the multimodal narrative with intelligent digital immersion, and exploring the intelligent micro narrative subject led by ChatGPT constitute multiple paths to improve the narrativ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ChatGPT

[责任编辑：廖 霞]